

# Souvenirs d'un

[法] 古伯察/著 耿昇/译

# voyage dans

# La Tartarie

# et Le Tibet

# 鞑靼西藏旅行记

中国藏学出版社

1846年，拉撒路派传教士古伯察（1814-1860）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法国人。他在蒙古、西藏和内地旅行期间，以其决心、适应能力和探索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他的经历表现出他是个卓越的探索者和民族学者，他的传记在当今堪称不朽的杰作。古伯察肩负着向“鞑靼人”（蒙古人）传播基督教的使命，他认识到，要使人们改信基督教，自己必须首先研究佛教。他历尽千辛万苦，历时八个月，来到西藏首府拉萨。同行的还有一位已改信基督教的年轻喇嘛名叫桑达强巴，以及一头骆驼，一匹白马和一只叫阿尔萨兰的狗。



Souvenirs d'un

[法] 古伯察/著 耿昇/译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中国藏学出版社

et Le Tibet

达鞑西藏旅行记

#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的入华之行

(译者代序)

耿昇

自19世纪中叶后来华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中,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 1813~1860年)穿越整个中国的长途旅行,最具传奇性和神话色彩。他自1839年8月入华,与其会长秦噶啐(Joseph Gabet, 1808~1853年)受遣使会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 1807~1868年)的派遣,于1841年2月20日离开澳门,并于同年6月17日到达当时法国在华传教区的所在地——北直隶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由此出发,经过热河、蒙古诸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历时18个月的艰苦旅行,最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在拉萨居留近两个月后,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经上奏朝廷获准后,将他们驱逐出藏。古伯察一行于1846年6月初到达西康首府打箭炉(康定),然后又先后经由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后,于1846年9月末到达广州,最终于同年10月中旬到达澳门。他由此而完成了这次环中国的长途旅行。

古伯察等人的这次旅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法外交交涉,是19世纪中叶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本文对此略作钩沉,以代本译著之序。

## 1. 古伯察的早期事迹及其入华旅行之缘起

古伯察家族原籍为法国的蒙唐(Montans),即今塔尔纳—加龙省(Tarn-Garonne)的一个地方。古伯察本人于1813年6月1日生于开吕斯(Caylus),位于蒙他板(Montauban)东北四十多公里处,为其家庭的七个孩子之一,<sup>①</sup>其父原为法军参谋部上尉。为了方便孩

① 雅克玲·泰夫奈(Jacqueline Thévenet):《西来的喇嘛》,巴黎塞格出版社,1989。

子们接受教育,古伯察的父母全家迁至图鲁兹。古伯察曾先后分别在图鲁兹的小神学院和神学院注册学习,主攻神学和哲学,这为他后来的工作与职业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后世研究人员都直言不讳地把这位蒙他板人说成是图鲁兹人。<sup>①</sup>

古伯察于1836年10月9日在巴黎参加了遣使会<sup>②</sup>。1838年5月25日,他从图鲁兹的大主教达斯特罗(d'Astros)手中受领神品证书;1839年1月28日由巴黎大主教盖伦(Quélen)晋铎。就在同一天,他高兴地致信父母,宣布他很久以来就想成为传教士的愿望即将兑现:“我收到自罗马发来的委任我作为教廷入华传教士的书简,我正准备前往我的传教区。”<sup>③</sup>这说明他对自己被教廷传信部任命到中国的一个宗座代牧区,感到非常自豪,从而在他那短暂的一生中,开始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 2. 古伯察为入华旅行而在澳门作准备

1839年3月6日<sup>④</sup>,古伯察其两位教友——巴黎与里昂的普里瓦(Privas)和沃特兰(Vautrin),到达位于法国北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勒阿佛尔(Le Havre),准备乘“阿代玛尔号”(Adhémar)船,起锚扬帆远航中国。“阿代玛尔”号建造于1829年,是一艘双桅横帆船,登记吨位为240吨,吃水深度为15法尺,长40~45米,宽8~9

① 如包世杰(Jean-Marie Vincent Planchet)为其《鞑靼西藏旅行记》版本所写的序言,北京西什库遣使会印书局1924年。

② 遣使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原来旨在向贫穷地区派遣传教士,故得名“遣使会”;由于它是于1625年由法国人味增爵(Vincent de Paul,1581~1660年)创建于法京,故又被称为“味增爵会”;又因创建于巴黎的圣一辣匝禄(Sain-Lazare)教堂,而被称为“辣匝禄会”。该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并不太活跃,活动区域有限,主要是向乡下人、平民、赤贫和病人布道。1773年传入中国。1785年解散耶稣会时,它接管了中国耶稣会传教区的一切财产。1804年5月27日,拿破仑应教皇庇护七世的请求,指定该修会的目标是“管理和主持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传教区,而培养和提供传教士”。从此该会活力骤增。古伯察一行正是在此背景下入华的。

③ 雅克玲·泰夫奈:《西来的喇嘛》第1章,《从开吕斯到勒阿弗尔》。

④ 对于古伯察偕一行驶离巴黎的时间,诸家说法有异,包世杰于《鞑靼西藏旅行记》的序言中认为是3月24日,泰夫奈于《西来的喇嘛》中认为是3月3日,伯希和于《秦噶啤和古伯察先生的拉萨之行》中认为是3月6日,本文采纳了伯希和的说法。



米。它以勒阿弗尔为船籍注册港。该船每两年远航亚洲一次,去时运载几名旅客,回程时运回以中国产品为主的大量远东商品,特别是丝绸、茶叶和香料。它虽不及1698年远航中国的法国“海神号”(“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rite)那样早、那样重要和那样著名,但它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中法经济文化交流中,也曾起过重要作用,故而值得略提一笔<sup>①</sup>。

“阿代玛尔号”船刚刚于1838年5月16日自远东返航。当时在巴黎的遣使会总司库德旺(Etienne)与船主签订了运送三名新招募会士赴澳门的合同。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船直到1839年3月6日才起锚,运载着古伯察一行三人(两名神父和一名修士)向远东驶去。

由于晕船、船上的简陋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要经常逆风航驶),古伯察一行历尽艰辛,历时110天,航程三万多公里,才于1839年6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停泊靠岸。1839年8月1日,他们一行终于到达了中国的澳门。古伯察后来曾写道:“在三个半月间,我们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太平洋、巽他海峡和中国海,终于在1839年8月1日这一天,到达澳门。”他在从澳门致普罗斯佩尔(Prosperè)的书简中指出:“我非常喜欢澳门,它在我心中激起了使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会珍贵的记忆。”<sup>②</sup>

澳门对于遣使会来说也意味深长。因为自耶稣会士自1773年离开之后,北京的主教——葡萄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a)曾要求葡萄牙教省的遣使会士们占据澳门的圣若瑟学院,并根据果阿学院的模式在那里建立一座中国司铎候选人的神学院。从1784年起,在葡萄牙女王玛丽娅一世的财政支持下,这项计划才得以付诸实现。同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紧急要求派遣法国遣使会士入华,以填补由于耶稣会士被迫撤离而留下的空缺。但在18世纪的澳门,葡萄牙“保教权”的势力尚很强大,以致法国的遣使会士们大都更希望避开澳门,从广州直接进入中国。但在19世纪时情况略有变化,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主要由法国

① 泰夫奈:《西来的喇嘛》,39~41页。

② 包世杰:《鞑靼西藏旅行记》序言。

和意大利天主教士所操纵,福建一带则属于自17世纪以来便盘踞在那里的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整个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分别属于天主教四大修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所以,从传教士们的观点来看,当时澳门已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了。

法国遣使会士在澳门的定居始于1820年。继湖北和河南教案之后,南弥德(Louis Lamiot)率几个中国青年信徒在澳门避难,从而初创了与葡萄牙圣若瑟神学院有别的法国遣使会神学院的雏形。1831年继任南弥德的陶若翰(Jean-Baptiste Torette),接待了由“阿代玛尔号”船首次运来的法国旅行家与传教士。法国住院住于澳门城的西北,距圣安东(Saint Antoine)教堂不远的地方。

古伯察刚到澳门便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从事多方位的准备。其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学汉语和习汉字,而且还必须是纯正的“官话”。其次是他要学习有关中国的一切知识。正如古伯察到达澳门的一个月之后,于1839年9月6日的一封书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必须逐渐放弃自己的全部旧习惯,甚至连吃饭和走路的姿态方式也成了我的学习科目。”<sup>①</sup>此外,他还以中国人的习惯穿衣戴帽,自称“天地神人之主”。这一切均是为了将来适应中国传教区的生活。他在澳门还违规而在中国遣使会巡按使陶若翰面前发誓。在获悉其教友董文学(Jeam Gabriel Perbyre, 1802~1840年)在武昌被杀身亡(罗马教廷曾将他封圣)的消息后,立即要求穿上这位殉教者的服装,虔诚地赴中国内地(主要是北方的蒙古地区)传教。因为自从法国传教区被从北京驱逐之后,他们便迁到了今内蒙古附近的西湾子。

古伯察入华时,恰逢鸦片战争前后。罗马教廷顽固地坚持抨击中国礼仪,禁止天主教徒尊孔祭祖,禁止外国传教士们穿戴儒装华冠,甚至禁止用汉语作弥撒礼拜仪式。入华传教士们依靠西方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以殖民宗主国政府为靠山,稍后又援引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渐开始横行乡里、鱼肉乡民、作恶多端,屡屡爆发“教案”。腐败的清政府对内镇压不遗余力,却无力抵御外辱。虽然自1821年起,在道光皇帝的推动下,《大清律》中加入了禁止

<sup>①</sup> 该封书简载《教会》(Ecclesia),第207期,71~72页,1966。

西洋人传播天主教的条款,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精心而又周密的策划,古伯察一行自澳门出发,前往内蒙古湾子传教区。

### 3. 古伯察一行从澳门到内蒙古的旅行

1841年2月20日星期六晚6时,古伯察一行乘他们租用的帆船,连夜从珠江口入关,秘密地进入了中国内地。2月22日,古伯察“完全进入了中华帝国。那里本来禁止任何西洋人进入并以处死相威胁”<sup>①</sup>,他详细描述了珠江及其支流西江两岸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南方门户广州大港。据他记述,广州地区于1840年左右约有一百二十万人口,其中1/3的人生活在水上。由于他是秘密地进入那里的,所以第一天与第一夜是在一名基督徒的地窖中度过的,自感漂浮在一个新世界的汪洋大海中。23日夜间,他继续北进,翻过粤赣两省的天然分界线梅岭而进入江西。古伯察进入赣南平原并渡过赣江后,又行进四日,才到达由其初修院中的教友白寿(Pierre Peschaud)主持的一个传教区,此人早于他两年出发赴澳门。遣使会士们自1838年才进入江西,江西与浙江两省均由拉谟(Alexis Rameaux)主教主持。当时仅在江西省,便有由7名传教士主持150多个小基督宗教的会口,传教士们对它们逐一巡视。古伯察在那里与教友共同度过了几天<sup>②</sup>。1841年4月1日,古伯察到达江西吉安,下榻于另一位遣使会士拉利伯(Bernard Laribe)的住院,以共同度过复活节,其中包括几名准备送往澳门神学院的青年人。

在离开江西之后,古伯察一行到达了当时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控制的湖北。在武昌城外,拜谒两名遣使会传教士刘方济(Clet)和董文学的墓地<sup>③</sup>。武昌的宗座代牧黎佐拉迪(Pizzolati)对此非常

① 古伯察1841年4月4~11日书简,载《遣使会年鉴》第八卷,363~395页,1842。

② 古伯察1841年4月4~11日的书简,载《谁还在想着鞑靼地区?》,由泰夫奈选编的古伯察书简集,巴黎基美出版社,47~67页,1992。

③ 1841年9月16日的书简,载《遣使会年鉴》第8卷,409~416页,1842。

赞成,并让当地的一名青年基督徒充当他的向导。

古伯察再从湖北到河南,一直进入直隶和北京,并且很快又向长城以外的蒙古地区前进了。

#### 4. 古伯察一行在内蒙古的居留

1841年6月17日,古伯察一行经过四个多月的中国之行,终于到达了今河北省的崇礼县县治西湾子。西湾子当时有八百多口人,基本都是天主教徒。1829年,一名中国遣使会士薛玛窠(Matthieu Sué)为逃避北京灭洋教之风潮,带领法国传教区的一批传教士和神学院的学生避难于此。巴黎的遣使会长上们对此地也颇感满意,分别于1835年派遣孟振生主教(1835年7月12日到达)、1837年派遣秦噶哗(1837年3月到达)前去支持该传教区。1840年,内蒙古经过两年附属于满洲宗座代牧区之后,又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宗座代牧区,古伯察的同乡孟振生成为该地区第一名领衔的宗座代牧主教<sup>①</sup>。古伯察于1841年到达西湾子时,内蒙古共有三千多名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为了逃避教案,从北京和内地其他地方迁去的汉人。由于在内蒙古的遣使会士们尚无与中原汉族信徒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去寻求与其他地方的蒙古人,甚至是与西藏人打交道的机会。这也是古伯察后来赴藏布道的原因之一。

古伯察等在西湾子停留期间,最大的成功是使齐氏和冯氏两名原喇嘛归化为基督徒,其教名分别为冯保禄(Paul)和齐彼得(Pierre)。他们成了西湾子最早的两名蒙古族基督徒。保禄帮助秦神父作翻译,并陪同他到附近地区巡视,尤其是1839年赴呼和浩特。彼得则由于其宗教虔诚而被孟振生主教派往澳门,古伯察于1840~1841年间曾在那里频频与他交往,而且正是身穿他的中式衣装离开澳门的。

古伯察在西湾子滞留长达近两年,以适应传教区的生活并学习汉语。他们的所谓“传教”工作,不过是作弥撒、举行圣事、讲授教义书、培养土著传道士、教基督徒们唱经和祈祷、照顾病人和小

<sup>①</sup> 古伯察1841年9月15日的书简,载《遣使会年鉴》,第8卷,397~408页,1842。

神学院的学生等。事实上,他的汉名古伯察,正是在西湾子居住期间才起的。

1843年耶稣升天节(5月25日)前夕,古伯察离开了西湾子,到东北方向的黑水和喇咧沟传教区去了。古伯察在澳门时结识的教友达京(Florent Daguin)偕另一位(西湾子传教区的第五位)遣使会士翁羊铎(Laurent Carayon),于1843年7月7日到达西湾子,再加上孟振生主教、秦噶啐和古伯察,在这个小小的法国遣使会教区中,已经聚集了六名遣使会士,在当时并不发达的西湾子确已显得人员太臃肿了。孟振生主教决定分流一部分人到其他地方去布道。蒙古翁牛特右旗(汉人称之为西敖汉王旗)库里图(Kulitu或Kulutu,可能应为古鲁头或呼必图)是位于黑水河畔的一个小村庄。黑水川过去是翁牛特旗一名蒙古王公的围场。乾隆时代(1777年),从山西迁来的一个汉族木材经营商张氏家族,将附近的马架子村全部购买下来,在那里开了一家商行和一家烧锅。其雇工之一的白氏,曾因与北京的天主教徒赵氏有交往而接受归化。张氏全家也都接受归化。此后,法国遣使会中国传教区的中心便设立在那里,无论是外国传教士、原住民、因受教案牵连而逃亡至此的中原汉人,纷纷云集于此。人们普遍认为,在1844~1845年间,整个内蒙古地区共有7000~8000名基督徒,分布在三个中心:中蒙古的西湾子、东蒙古的黑水和中蒙古的小屯沟<sup>①</sup>。不过,秦神父为了向罗马教廷邀功,于其上呈教廷的报告中,却指出内蒙古于1839年共有万余名基督徒,分布在小屯沟、热河、古鲁头、喇咧沟、桥头和九台沟等七个中心<sup>②</sup>。除了这六名法国遣使会士外,还有六名中国司铎,如薛玛窠(1860年12月17日死于西湾子的孟家坟)、韩若瑟(1844年死于宣化府),韩·克里斯冬(Christom,1891年死于北京东堂)<sup>③</sup>等人。

距呼必图有80公里处,在黑水河的一条支流上,便是金庙(Altan-Somé,阿勒坦一苏木),它是克什克腾旗的旗治(经棚镇)。此地已由过去的宗教中心变成了中原、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一处

① 《遣使会年鉴》,第11卷,439页,1846。

② 《遣使会年鉴》,第13卷,124页,1846。

③ 《遣使会年鉴》,第13卷,124页,1846。



重要商业枢纽。古伯察不断地进喇嘛庙中参观。他得出的结论是：“极端贫困的地区、极其富丽堂皇的寺庙和财宝堆积如山的寺产”。这是他在巴黎和中国内地从未见到过的贫富差异。

1843年11月，古伯察在孟振生主教的授意下，开始“速成”地学习蒙古语和满语，甚至还包括藏语。在距马殿（甸）子不远的桑寨河谷，生活着土酋托库拉（Tokoura）的儿子，此人任他的蒙文老师，此外还有藏米昂（Tsnmiant）喇嘛和附近佛寺的喇嘛，帮他学习藏语。但据洛内（Launey）于其《西藏传教史》和伯希和于其1926年发表在《通报》中的文章认为，古伯察的蒙文和藏文水平都只不过是略通一二。

1844年5月，秦噶哗率达京和保禄赶到黑水与古伯察会合。秦神父于前一年为划定蒙古传教区与满洲传教区的界限，而从事过长途旅行。因为孟振生主教已向他们下达了赴北部游牧蒙古人中去布道的指示。孟主教在1845年3月7日致教廷传信部的一封信筒中指出，他将派遣其教友古伯察和秦噶哗赴北部游牧蒙古人中，以进一步研究这些民族的习俗和性格，尽可能准确划定蒙古和满洲宗座代牧区的区界。“要在游牧蒙古人中作出首次尝试，以便于他们之中创建一个传教区”。“这些资金足可以使我们于去年向蒙古北部派去两名来自教廷的欧洲传教士。他们于1844年9月10日从蒙古—汉人传教区（指由汉人居住的蒙古地区的喇咧沟之马架子会口）出发。这就是秦噶哗和古伯察神父，两位都相当熟悉蒙语和满语，比较熟悉藏语，能够顺利地执行他们向蒙古人布道、并试于他们之中开辟一个传教区的使命”<sup>①</sup>。

以上就是古伯察在内蒙古居留期间的基本活动。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向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布道而作准备的。

## 5. 古伯察一行从蒙古赴西藏旅行

正如孟振生主教于1846年2月8日一封书筒中写到的那样：“没有秦噶哗和古伯察的任何消息……他们出发快两年了，前往北

<sup>①</sup> 《遣使会年鉴》，第11卷，444~446页，1846年。

方的蒙古游牧民中布教”<sup>①</sup>。两人本来是要赴蒙古北部喀尔喀人中布道去的,但由于这两个人的个人兴趣和害怕被俄罗斯人抓获的心理,故而转向西行,改道赴拉萨。事实并不像他们在事后撰写的著作中一再声称的那样,一开始便把西藏拉萨作为自己的既定目标。<sup>②</sup>

1844年古伯察在秦噶哗主教和原青海三川县的土族喇嘛萨木丹净巴(桑巴钦巴)的陪同下,从黑水或喇咧沟出发,经过18个月的旅行,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完成了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大旅行。他们沿途经过了热河,内蒙古的察哈尔、克什腾旗、多伦诺尔、察哈尔八旗、额附旗、卓资寺、喀尔喀大库伦、西土默特旗、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拉济卓隆、塔松诺布、阿拉善等地,宁夏、甘肃、青海。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的命令,将他们驱逐出藏并解往四川。他们于1846年3月15日离开拉萨,于同年6月到达康区的打箭炉(康定),然后又经过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于1846年9月末到达广州,同年10月中旬到达澳门,从而结束了这次环中国11省区的长途旅行。古伯察等是第一个进入西藏腹地的法国人,也是早期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少有的九个欧洲人之一。

古伯察于其1846年12月20日致德旺先生的书简中指出,他们于1844年8月3日离开黑水<sup>③</sup>。但伯希和于《秦噶哗和古伯察先生的拉萨之行》中却认为是1844年9月10日,泰夫奈于《西来的喇嘛》一书中也采纳了这一时间。对于古伯察一行到达和离开拉萨的时间,作者自称是1846年1月末,并于3月15日离开拉萨。后来包括包世杰(J.-M. Planchet)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采纳了此说。但秦噶哗神父于其游记中认为他们到达拉萨的时间是1845年12月末,离开的时间是1846年2月26日。伯希和经过认真而又仔细的研究后认为,他们到达拉萨的时间应早于1846年1月1日,离开的时间3月15日则显得太晚。这些细微差异,与古伯察著作中的丰富内容与中法交涉的重要性相比较,无关宏旨。

① 《遣使会年鉴》,第11卷,628~629页。

② 伯希和《秦噶哗和古伯察先生的拉萨之行》,载《通报》,151~154页,1926年。

③ 此信载《遣使会年鉴》,第12卷,118~182页,1847;《传信年鉴》,第19卷,269~308页,1847。

古伯察一行离开喇咧沟之后兴致勃勃,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在蒙古人中生活并归化他们的夙愿要实现了。为了沿途行动方便,尤其是为了避开清政府禁令的围截,他们均化装成西藏的喇嘛,因为西藏喇嘛会受到蒙古人尊重,故后人称他们为“西来的喇嘛”。他们两位不仅在旅行目的地方面,而且在旅行策略方面,都配合默契。

他们记下了大量有关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几次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相会、与西藏入贡使的同行、商品交易、灾异、开荒垦殖、动植物奇观、交通要塞等诸多方面的宝贵资料。但表象的东西记载多了一些,科学考察的东西却略显薄弱。马尔康(Markham)于其《西藏》(第94页)一书中认为,古伯察的著作缺乏科学性。托玛斯·霍尔底斯(Thomas Holdich)于《神秘的西藏》中也声称,孟振生派遣古伯察和秦噶哗西行,只是为了去西藏“游览”。就连一向捍卫古伯察而反击俄国探险家普热瓦斯基之诬词的英国学者玉尔(Yule)也认为,古伯察作为一名旅行家,太缺乏“地理意识”。法国人华遣使会士包世杰于其为古伯察的《鞞鞞西藏旅行记》所写的序中指出,科学考察并非古伯察的职业,因为他环中国旅行的目的是传教<sup>①</sup>。

下面,笔者仅根据古伯察的《鞞鞞西藏旅行记》一书,分地区地对他入藏沿途的见闻略作介绍。文中所引,除标明出处以外,均出自该书。

## 6. 古伯察有关蒙古诸旗和鄂尔多斯的事迹

古伯察一行从黑水川出发,经过了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多伦诺尔、墨尔根旗、察合尔八旗、额附旗、西土默特旗之后,到达了鄂尔多斯的蒙古人地区。

作者看到鄂尔多斯地区极其干旱贫瘠,那里只能种植荞麦和谷子,但线麻却生长得极其茁壮。在该地区旅行必须为人和牲畜携带充足的饮水。鄂尔多斯的居民们都居住在用破毡片和破羊皮搭成的简陋帐篷中,蒙古族和汉族居民们生活得非常艰苦。当时

<sup>①</sup> 载《传信年鉴》,第20卷,118~126页,1848。

蒙古诸旗中尚盛行奴隶制，牧民们必须依附他们的领主，不能任意去某一地方驻牧。

蒙古诸旗的王公都归附了大清皇帝，因为清朝皇帝也是鞑靼人（此说有误，满族人实为通古斯人）。这些王公们的尊号基本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公、伯、子、男等。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其辖地，仅仅承认清朝皇帝为其君主，绝不像中世纪欧洲那些好战的王公之间那样经常大动干戈。蒙古王公们始终都怀着尊敬的心情服从北京宫廷的决议，每年必须晋京朝拜天子，但清朝皇帝无权推翻各旗的统治家族。王公可能会因咎而被革职，但必须由其子嗣位。在十年之前，巴林部的王公被北京宫廷指控策划了反对大皇帝的阴谋，被理藩部判处剁脚刑，但王公托人向监斩官送礼，而监斩官也仅满足于割掉其头发和扒掉其靴底，然后上奏朝廷，由其子嗣位。蒙古地区的王公家族形成了一个贵族阶级，全部土地都属于他们。人们称这些贵族为“台吉”，他们均受蓝顶。各旗领主于台吉中选择协理台吉，一般有三名，名为图萨鲁克齐，帮助和协理王公履行职务。在图萨鲁克齐之下是图默勒，即管理无关紧要事务的低级官吏。最底层是那些精通蒙古语、满语和汉语的书记或翻译。他们均成了蒙古诸旗的官阶系列。

古伯察发现那些非王公家族的鞑靼人都是奴隶，他们生活于对其领主的绝对依附之中，除了纳税之外，还必须为其主子放牧畜群。但蒙古领主和奴隶们都生活在帐篷中，彼此友好相处。主子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奴隶的帐篷，奴隶们向他献奶茶，他们互相交换烟锅而共同抽烟，孩子们也不分贵贱地在一起戏耍。在鄂尔多斯地区，甚至出现了比主子还要富裕的奴隶。王公们从来不给奴隶们起有辱人格的绰号，称其奴隶们为“兄弟”。这种奴隶制远没有中世纪罗马奴隶那样严厉和违背天理人伦，它与残暴的罗马奴隶制截然不同，甚至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

古伯察详细记述了蒙古喇嘛活佛的转世、选定和坐床过程。一名大喇嘛圆寂时，绝不会使该寺的僧众们陷于哭泣和哀悼的沮丧气氛中，因为蒙古人大家都知道沙布隆即将迅速转世。这种圆寂只不过是生死轮回链中的一环。上师的弟子们都处于焦急等待之中，他们在彩虹出现时去请懂得人世界奥秘的占卜师打卦，询问其寺住持已在西藏的什么地方转世。由活佛转世的灵童一生下来就

会以权威的口吻说：“我是大喇嘛，某某寺的活佛。请把我带到我原来的喇嘛寺中，我是该寺永生的住持。”鞑靼人获悉后就立即出发赴西藏迎接活佛回寺。他们经过艰难的旅行后就会到达灵童出生的地方，经过一番考察验证之后，便将他迎了回去。新活佛坐床时，当地所有王、公、官吏、喇嘛和奴隶们都来参加。除了这名活佛之外，蒙古人始终都要于其王公家庭中选择另一名大喇嘛。那名西藏出生的活佛仅仅是供人崇拜的偶像，而实际上要由蒙古大喇嘛行使具体职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即“国王掌权不执政”的局面。在这两位住持下，还有数名低级僧官。他们参与管理具体事务：收入、采购和戒律。此外，还有喇嘛们的弟子——沙必。这些喇嘛们必须学习藏语和藏文经文。

对于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婚姻习俗，古伯察也有详细记述。蒙古青年人结婚是由父母和媒妁安排的。新娘不带嫁妆，而是由男方提供聘礼，聘礼多少由男方父母的慷慨程度而决定。一切都要事先安排并作公证。举行婚礼前先要向家中供养的佛像上供，供品为一颗煮好的羊头、鲜奶和一条白哈达。婚礼由喇嘛主持，双方的亲朋参加婚宴，婚宴一般持续7~8天，由说唱艺人表演节目。鄂尔多斯地区实行一夫多妻制，正妻为家庭的主妇，也是最受尊重者，侧房则必须尊重大房。由于该地区喇嘛太多，为了不使过多的妇女无人赡养，该地区才被迫实行一夫多妻制。夫妻间的离婚也不必经由官府，丈夫可以随时找到一种借口休掉妻子，任何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丈夫得到了众人因婚礼而送给他的绵羊和马匹，而被休女子的父母也可以再次将其女儿出嫁以换取新的嫁妆。

在鄂尔多斯的拉济—卓隆寺，大喇嘛可以自我剖腹而又不会死亡。博克图为了显示其法力，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斋戒之后，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登上莲台，从腰间解下一口钢刀放在膝盖上，与喇嘛们共同诵经之后，便操起锋利的钢刀，将腹部剖开。众僧纷纷向这一进入三昧态的喇嘛询问奥秘事务、未来的事态和某些人的命运。博克图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被视为神谕的回答。他最后将伤口的血搜集起来，诵经运气，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古伯察对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便认为是魔鬼于其中起了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剖腹本领的喇嘛们都不是上层大喇嘛，而是名声不好和不大受人尊敬的游方喇嘛。那些严守戒律的正统喇嘛认为所有这类表



演都是邪恶无益的，普遍对此表现出了鄙夷。但寺院的教祖们并不禁止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几天用于类似的表演，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香客和获得更多的布施。出于同样的原因，寺院成了汉蒙两族僧众进行互市的地方。喇嘛们作剖腹表演的日子，也正是举行大型庙会的时间。

古伯察一行在阿拉善旗遇到了进京朝觐的阿拉善蒙古王爷。这些王爷们每年要于农历正月一向清朝皇帝朝拜。他们与阿拉善王爷同行了一段时间并互相交谈。清朝藩部王公们晋京，首先是为了表示和确认对朝廷的归附与臣属关系，其次是为了向大清皇帝纳贡。这类“朝贡”是任何藩部王公都不能拒绝的，贡品主要为优良品种的骆驼和马匹，皇帝用它们来扩充他那饲养在察哈尔的大批畜群。阿拉善王公也必须进贡他们的方物，如鹿肉、熊肉、獐子肉、香草、山鸡、蘑菇和鱼类。由于他们在冬季晋京，这些食品都已被冷冻了，所以不会腐烂。他们每年还向清朝皇帝进贡大批山鸡蛋，以供皇宫制作后宫嫔妃们用的涂发油蜡。这些贡物成了鞑靼王公及当地民众的一种沉重负担，平民们必须服徭役、纳税、上贡方物和提供马匹牲畜。藩部王公到达北京之后，都居住在被指定的区域内。宫中一名高级官吏管理入朝的这些高贵王爷们，一般每年都有两百多名，他们在北京时不与皇帝本人有任何交往，也没有任何隆重的召对。春节那一天，这些藩部王公都必须去参拜太庙并跪拜皇家先祖。他们在太庙过厅的一条大道上列队，以恭候圣驾，依其品位高低而排成行。皇帝以隆重的礼仪从宫中出来，到达太庙时则受到所有人山呼“万岁”的欢迎。天子穿过他们的跪拜行列而进入太庙，向先祖灵牌跪拜三次。两百多名王公都要毕恭毕敬地跪拜在那里，只有当皇帝起驾后才敢离开。所有鞑靼王公都由清朝皇帝发给俸银，这种措施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政治效果。藩部王公们接受俸银之后就成了大皇帝的奴隶和仆从，皇帝也有权力要求他们言听计从和俯首帖耳。这一年，藩部王公们都收到了皇帝用镀银铜锭冒充银锭而发放的俸银，这是由于奉旨发放俸禄的朝中官吏从中作弊之故。

这一年正好天大旱，阿拉善地区的牲口至少有 1/3 死亡。由于路途艰难，古伯察一行决定不再从阿拉善地区旅行入藏，而是渡过黄河，进入甘肃（实为今之宁夏），然后再从甘肃经青海入藏。

## 7. 古伯察有关甘、宁、青地区的记述

古伯察一行离开黑水川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旅行到达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和青海的部分地区)。

他们渡过黄河便到达了黄河畔石嘴子城,下榻于一家仁义店。该地区不再是蒙古人的帐篷,而到处都是砖木结构的建筑。店主公殷勤好客。石嘴子附近有丰富的煤矿,开发经营煤炭成了当地人的主要财源之一。该城的东郊由大型瓷器作坊组成,生产贮水的大缸以及其他各种瓷器,甘肃省每年向外输出大量的这类瓷器。石嘴子的食物很丰富,昼夜间到处都有流动饭铺送饭上门,牛羊肉、米饭、面条、糕点、蔬菜一应俱全。该地区的居民都是头戴蓝色小帽的回民。石嘴子附近的土地非常肥沃。引黄灌溉工程系统非常发达,所有田地都被精耕细作。

古伯察一行到达了宁夏城。该城的城墙已非常古老,但保存完好。宁夏城是一座古老的王城,距鞑鞑人地区不太远,但其贸易却不具任何规模。该城已部分地遭到了遗弃,但从宁夏到下河堡一段,则又是风景如画,到处都呈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最佳圣景却要到中卫,那里的富庶景象与宁夏城则具有天壤之别。

离开中卫之后,古伯察等人又返回了阿拉善沙漠,沿着清朝向伊犁发配充军人员的道路前进。经过长流水、高塘子等干旱和常遭土匪骚扰的地区,他们再次翻过长城,经过三眼井之后,又到达了富庶地区。在甘肃的这一地区,土地肥沃,以种植小麦为主,所消耗的不太多的大米要从邻省调入。该地区的山羊和绵羊均属优良品种,羊肉和面饼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物。那里取之不尽的煤矿资源又使当地人有了唾手可得的燃料。甘肃成了最适于过舒适生活的地方。

古伯察发现甘肃的居民并不是纯汉族血统,他们之中的鞑鞑—西藏血统者更多,也更加突出与明显一些。这一点更为清楚地表现在农村居民的性格、语言和习惯方面。他们之中没有汉族人的那种过分繁缛的礼节,相反则以其粗犷的坦率好客而引人注目。人们在汉语方言中可以发现一大批蒙语和藏语词汇,句型结

构非常特殊。其食物则是汉人不大喜欢的奶、酥油和奶子酒等。甘肃有许多香火旺盛的喇嘛庙，遵循经宗喀巴改革后的藏传佛教崇拜仪轨。

古伯察提到了甘肃的一个很奇特的民族察罕胡尔人（白胡尔人，应该是指土族人，但也可能是指裕固族人）。他们居住在三川地区。察罕胡尔人个个都是足智多谋和智力超群的人。他们所操的是蒙语、汉语和东部藏语的混合语言，不过他们自称属于鞑靼民族血统。察罕胡尔人归附了清朝大皇帝，但他们却由一批世袭权力的“土司”统治，其中的吉土司和杨土司是最著名和最令人生畏者。杨土司在长时间内曾对西藏首府拉萨施加过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在1845年的诺们罕事件之后遭到了破坏。

古伯察一行经过庄浪河、平番、河交邑、平口、老鸭堡……之后，到达了西宁府。西宁是一座庞大的城市，但居民不大稠密，其商品大都被丹噶尔城截留。丹噶尔是位于甘肃和青海边境上一座小城。西宁府的客店中不接受诸如鞑靼、西藏和其他藩部来往过客，这些人必须前往“歇家”去投宿下榻。歇家的食宿和招待都是免费的，但歇家掌柜的要对经商者们出售和采购的一切征收一种所得税。开设歇家必须经官府批准，并向官府纳税。

古伯察一行人经过西宁城后到达了丹噶尔。该城居住有西藏人、西番人、红毛儿人、额鲁特人、保罗人、汉人、青海鞑靼人和古代从突厥斯坦迁来的穆斯林后裔。丹噶尔城有许多歇家，大都由穆斯林们开办。

从丹噶尔进藏，由于道路艰险、气候恶劣、土匪出没，所以古伯察等一行无法单独从事这次旅行。他们便决定在这里停留下来，等待八个月之后从北京返回的西藏晋京朝贡使的到达，以附他们入藏。古伯察与秦神父从塔尔寺请来了大胡子桑达拉为老师，开始向他学习藏语。新年之后，他们又迁到了塔尔寺僧房中借宿。古伯察留下了对塔尔寺及东科尔寺的长篇而又详细的记述，有许多内容是其他人未曾提到过的。他提供了有关这一时代塔尔寺的珍贵资料。

塔尔寺当时共有4000名喇嘛，出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在一条宽而深的河沟中，各种飞鸟鸣叫和飞舞，山坡上是一片白色的僧房。金顶大佛寺上飘扬着六角彩幡，在山坡上每前进一步都